

杜若鴻◎著

北宋詩歌 與政治關係研究

振醉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cknowled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杜若鴻
◎ 著

北宋詩歌 與政治關係研究

振辭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 / 杜若鸿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301-25233-8

I. ①北… II. ①杜…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2146 号

书 名	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
著作责任者	杜若鸿 著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23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9.75 印张 221 千字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沈松勤

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在宋代,由于士人集官僚、学者和作家于一身,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的复合型主体特征与知识结构,在作家群中普遍形成了“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风尚,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亲密,而且在北宋中后期,还出现了诸多以政治为纽带而形成的、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诗人群”。因此,从政治角度切入,考察文学,乃宋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条路径。

政治包含了诸多层面,不同层面的政治活动与文学的关系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尽相同。譬如,作为制度层面的科举取士,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主要方面在于应试者的心理、诗文修养与科考的内容。在北宋,由于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存在宗经崇道与尚文宗艺的差异,在以经义还是诗赋取士上,发生过冲突和争议,这对诗文创作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着统治者在科考制度与内容上的调整。而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层面的科考变动,则直接影响着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创作风气。一般认为,始于宋初而盛于仁宗朝的所谓“诗文革新运动”,其性质就是借助诗文复兴儒学,集中体现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至于神宗熙宁以后,因王安石变法引起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新旧党

争”，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也变得更为具体。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就是指苏轼批评新法实施后产生种种弊端的诗文学作品，而苏轼的“好骂”，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关注时事、批判时政的一种创作风格。又“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元祐学术”之禁等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实质上同时也是文学事件，其与文学的关系或对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这就需要如本著作超越纯粹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模式，而从政治及法学层面入手，考察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揭示其内涵特征，从更高、更深的层面回归文学。

一方面，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政治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特性和运行规律的文化层面，考察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将两者作简单的凑合，而是要揭示其间的中介，即作者这个创作主体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只有通过作者对政治产生润肌切骨的感受、并由此萌动艺术抒发的冲动与渴望后，政治对文学才能发生关系，产生影响，作为文学创作的政治生活素材才能转化成为生动的艺术形态；另一方面，政治并非与所有文学创作发生关系，或者说，政治不可能影响所有文学创作，文学的反映是多元的，其任务在于从多元生活中揭示人性人情，向读者昭示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在宋代，被视为“有玷令德”的“小道”之词盛行不衰，就是一个明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宋代诗人的生活及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可以说是：生活的诗化，诗的生活化。在宋代诗人生活化的诗歌中，如本著作者所言，政治是他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多元生活中所呈现的人性人情。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宋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不少成果。若鸿君在现有成果的基

础上,专门以北宋“政治诗”为考察对象,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著成《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书中就科举制度的变化与诸多诗祸对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诗人的政治生活与论政精神、诗歌功能及其语言风格,嘉祐以后诸多诗人群体的政治色彩及其政治诗的特色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从中揭示了北宋不同时期的诗人在不同政治运作中情志活动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系,就北宋“政治诗”的发展原因、发展过程、政治内涵和艺术特点,向学界贡献了独到的看法,对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作出了卓越的推进之功。此项研究,对中国文学其他各类文体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若鸿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获法律学士学位;后来放弃了非常热门的法学专业,考入浙江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随我研治唐宋文学。作为导师,我深深感知到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在一起谈论文学、国学等话题时,体现出他非常强的悟性。2004 毕业同年,其硕士学位论文《柳永及其词之论衡》在浙大出版社正式付梓。不久,若鸿转投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邓昭祺先生门下,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研究》,便是其博士学位论文,体现出作者孜孜以求的为学精神。在为其作序的同时,期待若鸿将有更多学术成果问世。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于杭州

目 录

序	沈松勤	1
第一章 绪 论		1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前瞻		2
三、北宋诗歌和政教		6
四、研究方法和范围		14
第二章 北宋科举罢考诗赋与诗歌转变		17
一、引 言		17
二、政治上的右文国策		17
三、科考内容的重大转变		21
四、科举改革的政治本质		23
五、对熙宁后诗歌的影响		27
六、本章小结		32
第三章 北宋诗歌分期和政治关系		34
一、引 言		34
二、宋诗发展的各家之见		34
三、宋诗各期的政治特色		39
四、群体关系的政治纽带		43
五、各个时期的诗人群体		47
六、本章小结		49

第四章 朋党之争与台谏势力的关系	50
一、引言	50
二、党同伐异的党争本质	50
三、异论相搅的台谏品格	56
四、对中后期诗歌的影响	59
五、本章小结	60
第五章 北宋重要诗案事件和诗歌发展	61
一、引言	61
二、乌台诗案	62
三、车盖亭诗案	68
四、崇宁全面文禁	73
五、本章小结	77
第六章 北宋政治诗的内容类型和艺术特点	79
一、引言	79
二、北宋政治诗的发展历程	80
三、政治内容类型	82
四、整体艺术特点	87
五、本章小结	91
第七章 沿袭期前后的政治诗	92
一、王禹偁的诗风革新	93
二、杨亿及西昆诗风评议	109
三、范仲淹的恢复风雅	130
第八章 嘉祐诗人群的政治诗	147
一、引言	147
二、务道致用的政治观	147

三、欧阳修	155
四、梅尧臣	166
五、苏舜钦	175
六、本章小结	184
 第九章 新党诗人群的政治诗	187
一、引 言	187
二、王安石	188
三、舒 亶	199
四、沈 括	204
五、本章小结	208
附表:新党诗人群重要成员行履	210
 第十章 苏门诗人群的政治诗	215
一、引 言	215
二、苏 轼	215
三、张 耒	224
四、秦 观	227
五、苏 辙	232
六、本章小结	238
 第十一章 江西诗人群的政治诗	240
一、引 言	240
二、黄庭坚	240
三、陈师道	270
四、其他成员	275
五、本章小结	276

第十二章 结 论	277
一、罢考诗赋与诗歌重大转变	277
二、北宋诗歌分期与诗人群体	279
三、诗案事件和诗歌发展转向	281
四、北宋政治诗的内容类型	283
五、北宋政治诗的艺术特点	284
六、各诗人群及其政治诗特色	285
七、北宋政治诗的定量统计	287
八、北宋政治诗的定性分析	289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303
Abstract	305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关于宋诗的优劣,或褒或贬,学界意见较为纷纭,但不免偏向于“尊唐抑宋”。宋型政治文化(尤其是相对于唐型而言)和宋诗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要对宋诗作出客观的评价,不能单从文学本体考察。宋诗从产生到定型,广泛受到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美学思潮、文学思潮、士人心态和文学演变规律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①,本书集中考察北宋诗歌和政治的关系。

宋诗的“原生状态”是相当复杂的,跳出纯粹从文学角度的考察思维,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宋诗与发生学上的种种关系,较诸囿于诗体艺术本身的观照,更有助于我们客观和中肯地评价宋诗的政治内涵和艺术特色,对于理解宋型诗人的创作思维和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②的独特风貌,会提供很大的帮助。

① 参杜若鸿:《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1期(2004年1月),页102—108。

② 关于宋诗的主要特色:“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学界视之为“宋调”的主体特色来与“唐音”区分。参吴淑钿(1952—):《陈与义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一章,《绪论》第二节“宋诗的特征”、第三节“宋诗的流变”,页4—38。张高评(1949—):《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台北:洪叶文化有限公司,1995年),页157—302;又见缪钺(转下页)

宋诗的政治内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涉猎当时政治上的多个层面,具有关注现实的内涵,可提供一个渠道,给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况。审视诗歌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能多提供一个新视角来观照北宋诗歌的发展。

以史证诗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清钱谦益(1582—1664)的杜诗研究,当代陈寅恪(1890—1969)的诗史研究,钱锺书(1910—1998)的宋诗研究,都是典型的例子。本书运用这一方法,探讨宋诗的政治内涵和艺术特点,同时,对当前北宋诗歌研究的不足进行了补白,作出纵深的研究,使此研究领域具有更丰富的资料。相信此项研究,对其他文体和政治关系的研究能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前瞻

二十世纪至今,关于北宋诗歌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广义上属性相同的论著有以下数部。

祝尚书(1944—)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①,将科举制度的沿革变化和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等方面作了考察,其中有部分篇幅探讨了宋代进士考试的诗赋经义之争、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的时间考、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科举作为北宋右文国策的重要一环,具有突出的政治化本质,有关诗赋考试的存废,直接影响诗人的

(接上页)(1904—1995):《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周裕锴(1954—):《宋代诗学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詹杭伦(1954—):《方回的唐宋律诗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157—158。(注:在非嵌套的情况下,本书使用单书名号作为篇章号。)

①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命运和诗歌的发展,考察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是值得进一步作专门探究的课题。

陈元锋(1955—)的《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①,系统地研究了北宋馆阁和学士院制度,揭示制度中的政治和文学内涵。北宋主要诗人的从政方式和生活状态,可从论述中得到一些参考数据。作者集中考察了淳化至元祐年间诗坛的唱和情况,从宏观角度展述了馆阁词臣的诗歌风貌。事实上,北宋诗人群体的形成,诗人之间的政治宗向是其中一条纽带,群体的形成最终又对诗歌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北宋诗歌和政治的关系,可借加强对诗人群体的研究,从群体诗人的创作面貌得到更具说服力的论断。

沈松勤(1957—)的《北宋文人与党争》^②,从北宋党争的文化背景、党争与北宋文祸、文人仕履、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等方面作了考察,是一部集中分析北宋党争下文人命运和文学演化的专著。文中考察时期始于熙丰变法,终至绍述党锢,集中于探讨中后期的党争对文学的影响,对本书集中于探讨诗歌领域启发殊多。

萧庆伟(1964—)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③,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北宋熙宁变法后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描述北宋党争和文祸的关系;第二部分探讨新旧党争与党人之间的关系,考察文人在党争下的心态演变历程。此两部分较多从史的角度入手。第三部分集中探讨广义的文学风貌之形成和演变。作者并非专力探讨党争和诗歌领域的关系,但当中的论述不免涉及北宋中后期的多位重要诗人,颇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① 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②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林宜陵(1971—)的《北宋诗歌论政研究》^①,探讨了朝廷政策对诗人论政态度的影响和北宋诗歌的论政内容,可资参详。然而,该书对于科举考试内容争议对诗歌发展的影响,重大诗案事件和诗歌转向,政治诗歌的内容类型和整体艺术特点,诗歌与政治两者结合的利弊,等等问题,或没有涉猎,或所论不详,尚有较大的补足空间。研究方法上,未见善用定量统计、定性分析和对诗人群体的总体论述,尚可进一步开拓。

吉川幸次郎(Kōjirō Yoshikawa, 1904—1980)的 *An Introduction to Song Poetry*^② 是一部有关宋诗的概论,对北宋主要诗人如王禹偁(954—1101)、杨亿(974—1020)、范仲淹(989—1052)、梅尧臣(1002—1060)、欧阳修(1007—1072)、苏舜钦(1008—1048)、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等有概略的叙述,论及北宋诗人的社会政治关怀的篇幅不多,有些观点值得进一步考察,如作者指出诗人对社会的承担意识,在宋代之前并不具社会普遍性质(universal quality),但在宋代的诗人中,很难找到一位没有写有关政治社会评论题材的诗。^③ 事实是否如此,本文将作进一步的观察。

Colin S. C. Hawes 的著作 *The Social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he mid-Northern Song*^④ 是一部考察北宋中期诗歌的专著,该著分为六个篇章,以北宋诗歌功能的角度

① 林宜陵:《北宋诗歌论政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

②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③ Kōjirō Yoshikawa, "With the Song poets—at least the greatest of them—the quality becomes ubiquitous. It is a rare thing in the Song to find a poet who did not write poetr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Song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0.

④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作为切入点,指出北宋中期诗歌作为政治社会的批评工具、文人游戏、建立人际关系、治疗身心、复古文化、表达对天地自然的关怀等六个功能,文中的第一章主要以梅尧臣和欧阳修为例,运用量化的研究方法,指出两人的政治诗歌所占比例不多,政治题材只能说是北宋中期以至后期诗人的一个关注点。这种定量的统计方式以数据作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本文将这种方法扩展至北宋的其他主要诗人,除了采用这种方式统计其政治题材占全集的比重外,并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以求更全面论述诗歌的政治面貌。

本研究还可在宋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当时诗案发生的政治处境。罗家祥(1957—)的《北宋党争研究》^①,是全面的党争史著作,该著从政治史角度,探讨了北宋政治的发展与党争关系,就熙宁、元丰、元祐、绍述一直到北宋晚期的政局都有较深入的分析,其所论述,对于我们了解北宋诗歌的政治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何忠礼(1938—)的《宋代政治史》^②是较全面的宋史概述,作者以北宋各朝君主的政治情况分章探讨,研究北宋诗歌,可借此对不同时期的政治有大略的掌握。

从以上的回顾,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尚可从多方面进行纵深的研究。首先,重新考察科举考试内容争议的本质,并深入探讨其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其次,围绕重大诗案事件和涉及的诗人、诗歌论述,重点审视每起诗案的本质,及其对诗歌转向产生的连串影响。其三,加强考察北宋中前期文人如何以复古思想和恢复风雅的角度批评西

① 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② 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昆体,促进诗歌体格的复雅归正。其四,析述北宋政治诗歌的内容类型和归纳其整体艺术特点。其五,统计政治诗占诗人专集的比重,并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论述诗歌的政治内涵和特色。其六,加强对诗人群体的研究,从群体的创作面貌得到更具说服力的论断。

三、北宋诗歌和政教

关于政治的最终目的,从儒家的思想角度看,乃通过“礼乐刑政”的治理手段,以达致天下大治的局面。本文的“政治”也是从这方面立意,涉及内政外交的内涵,包括政治措施、军事武备、国防外交、朋党之争、变法之争及由政治衍生的国计民生问题,从中可见北宋诗歌和政治的关系。

依儒家角度,古代政治运作的理想模式是:明君主导,贤臣辅佐,百姓服从,各安本分。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内涵,即使是发展到宋代这个谓为成熟型的政体,都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政治”(politics),表面上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共同的统治活动,但实质上,这种管理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君主自称“上承天命”,俨然定于一尊,臣子只有劝谏而没有制衡的能力。行政、立法、司法虽分布于不同的部门,但最终权力的核心仍在君主。现实政治运作既缺乏外在的规范,对君主及臣下则只能停留在自我道德完善的要求上,把国家的安定寄托在明君贤臣的德政上。这样一来,给政治带来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不是探讨如何组织国家即建立何种政体的问题,而是解决在君主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

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所谓的‘治国之道’。处理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君主统治”^①。古代政治的主要目的乃在于通过日常的“布政治事”,严守君臣民之职分,以维持官僚的统治方式。从秦朝(前 221—前 206)一统以后至明代(1368—1644)中叶,极少再涉及有关政治制度本体的哲学思辨,尽管朝代更迭,历代政治架构亦不尽相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官僚治体”(bureaucracy)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牟宗三(1909—1995)谓:

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对治权而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进展。^②

认为传统中国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此观点不失巨眼。

金耀基(1935—)也谓:

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实是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所支配,整个官僚系统并不是与君主平立或对立的,而根本是臣属于君主的。^③

① 孙关宏(1935—)等主编:《政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9。

②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章,页1。

③ 金耀基:《中国的传统社会》,载《中国文化篇章导读及综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161。